

# 吴越国钱氏对儒家文化的持守

陈兆肆



◀吴越国国王钱镠画像。 资料图片

吴越国(907—978)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之一,由临安钱镠所建,定都杭城,历经三代五王,享国72年。吴越国全盛之时,曾统辖两浙,包括今之浙江、上海及江苏东南部、福建东北部。是时,天下扰攘,世衰道微,如《新五代史》所论:“礼乐崩坏,三纲五常之道绝,而先王之制度文章,扫地而尽于是矣。”延续1400余年的中国儒家文化,至此几有断绝之虞。然当此乱世,起自行伍而偏安东南之钱氏,却能持守儒学,绍续斯文,使吴越之地久沐儒风,为日后纳入同样崇文之赵宋奠定文化根基。

## 奉《春秋》大一统之义

钱镠出身贫寒,早年读书未广,不过稍有余暇,则“温理《春秋》,兼读《武经》”。性喜兵事的钱镠读《武经》不足为怪,但于儒家经典《春秋》反复研味,其意深长。《春秋》开篇道:“元年春,王正月。”《公羊传》对此释曰:“元年”乃君主即位之年,“春”为一年之始,而“王正月”则系周天子所定之历法正月。何以强调使用周王朝的正月?《公羊传》答曰:“大一统也。”孟子承继《春秋》一统之义,接续指出:天下要稳定,就必须统一,而统一之主须是“不嗜杀”之“厚德好生者”。显然,“大一统”

不仅是领土的并合,更须历法同源,制度共贯,德教同风。

几度“温理《春秋》”的钱镠,深受“大一统”义理的影响。钱镠初未尝无一统之心。其在位既久,年号屡更;国仪所行,僭越颇多。其改贯休献诗中“十四州”为“四十州”,凡此皆能显其个人志向。不过,钱镠临终之前,知其子孙柔弱,不足以与强邻及中原争衡,故在临终前留下“善事中原大国”“如遇真君主,宜速归附”等遗嘱。所谓“中原大国”之“大”,突出的是“势”;而“真君主”之“真”,则

彰显的是“德”。钱氏遗训并非仅仅是审时度势下的权宜之计,也根植于对儒家“大一统”和“正统”观念之深切认同。继位后的钱元瓘“好儒学”,接受父亲遗训,改用中原年号,纳贡称藩,与中原王朝达成远交近守的共识,寓“护全东南”于“尊奉中国”之中。末代君主钱弘俶更是“纳土归宋”,最终践行钱镠遗训。978年,钱弘俶赴汴梁朝见宋太宗,呈献十三州版籍,苏轼赞其“有功于朝廷甚大”。此举使百姓免受兵燹之苦,避免南北分裂,加速统一进程,深契《春秋》“大一统”之精义。

## 行《孟子》民本之道

唐中期韩愈提出儒家“道统论”,明确孟子是孔子的再传之人。自此,孟子地位日隆,影响日甚。在孟子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”思想的影响下,吴越国钱镠确立了“保境安民”的国是,并为后续诸王相沿不改。

钱镠面对术士“填西湖、广牙城以延千年国祚”的建议,断然拒绝道:“百姓资湖水以生久矣,无湖是无民也,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?”这一抉择显然是将民生置于首要位置。此后,他又修筑石塘、疏浚西湖、置撩湖兵、凿九十九眼井,使杭州“沮洳斥卤,化为乐土”。钱弘佐继位后,询问仓吏粮食蓄积之事,得知能用十年后,便下令:“军食足矣,可以宽吾民。”随即蠲免境内三年之税。十三岁少年君主,以仁政治国,史载“勤理政务”。钱弘俶纳土归宋,固因形格势禁使然,然欧阳修赞其因此而“民幸富完安乐”,亦可见民生实为其一大关切。孟子言“惟智者能以小事大”,吴越历经五王,保境安民,正得力于“以小事大”之智。又《孟子》开篇辨义利: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钱镠《家训》中“利在一身勿谋也,利在天下者必谋之;利



杭州钱王祠内疏浚西湖壁画。 资料图片

在一时固谋也,利在万世者更谋之”,与孟子“何必曰利”之旨遥相呼应。明初钱唐(钱十六世

孙)抗疏入谏,力保孟子配享孔庙,称“为孟轲而死,死有余荣”,亦可见孟子之教深入钱氏血脉。

## 承《礼记》修齐治平之志

《礼记》为儒家要典,其《大学》一篇言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明内圣外王之道。修齐治平的理念深刻影响了钱氏家族教育。《钱氏家训》由钱镠初创“八训”,临终又作“遗训”十条,后经钱弘俶整理补充,最终由钱氏后裔钱文选定型为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社会四部分。这一框架与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功德理想一一对应,更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日常生活准则。

自宋以后,钱氏家族虽簪缨不绝,但总体上渐由政治型家族向文人学者型家族转变。但即便如此,修身、齐家之风一直谨守不怠。可举一例,稍加说明。唐后期,朝廷鉴于钱镠平叛浙东董昌叛乱有功,曾赐予“金书铁券”,给予“卿恕九死,子孙三死”等司法特权,后世王朝一般也对此承认。然而,此后漫长的一千余年,除明初动用一次特权

外,钱氏后嗣悉能恪守家训,勤俭廉介,未尝轻罹法网。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明中期钱塘势族嘉靖皇帝祖母一族邵氏。邵氏亦曾获赐“金书铁券”,但其家教不兴,家风陵替,最终沦落到子嗣拆毁祖坟砖石以换取钱财的地步。两相比较,高下立判。对待礼乐之祖周公,吴越钱镠在初政之时即视其为楷模。其建“握发殿”,即取周公“一沐三握发,一饭三吐哺”求贤之意。此时天下纷乱,如同战国之际,“诸侯方欲力争,竞招英雄,以自辅翼。此乃得士则昌,失士则亡之秋也”。史书记载,钱镠效仿周公,广纳贤才,如对待礼才傲物的名士罗隐,即便其常常出言不逊,钱镠也能“怡然不怒”,予以包容。

吴越钱氏亦深受《周易》影响,其变通之道、忧患意识、利天下情怀,皆可在《周易》中找到原型。

而后世钱氏研《易》者,亦代不乏人。吴越钱氏颇重诗教,养成了温柔敦厚的品行。钱镠“好吟咏”,有空则命子孙讽诵诗赋,或以所制之诗,赐予丞相将吏等。吴越之国,以儒为底色,崇尚和而不同,故能融释纳道,兼容并包,蔚为东南佛国。此时,儒、释、道三者辉映,相得益彰。客观而言,钱氏践行儒家等理念,未能尽善尽美,亦有苛征为时人所讥,然较之彼时大多邦国,尚属宽厚之政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言:“唐宋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、四方鼎沸的时代,独两浙在钱氏的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90年”,此与钱氏持守“一统”“民本”“家国”“变通”等儒家文化理念密切相关。正是这份对儒家理想的持守,构成了介于唐宋之间这一地方政治势力维系中国认同的文化根基。

据孔子研究院公众号